

## 重思《文子》与《盐铁论》的关系

锺福强\*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 内容摘要:

何志华声称《文子》与《盐铁论》共有 13 则重合资料，并重点分析其中一则，试图证明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在汉昭帝盐铁会议（前 81）以前就已经完成。本文欲检讨这 13 则材料是否能被视为盐铁会议参会者曾经引用《文子》的证据，以进一步澄清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年代。经本文分析，这些材料多数都可以从共享“公共素材”的角度来理解，却无法作为盐铁会议参会者征引《文子》的有力证据。因此，何志华认为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在汉昭帝盐铁会议以前就完成了的观点无法成立。今存本《文子》的编纂还是可能在盐铁会议以后才发生。

### 关键词:

文子，盐铁论，老子曰，贫国若有余，公共素材

---

\* 电邮地址: hchoongkeong@gmail.com

## 前言

討論《文子》成書時代的問題，不能回避學界迄今所討論過的戰國西漢引《文子》之材料。學界對這些材料業已經過多次討論，大致有了比較清晰的分析。所謂戰國西漢人物文獻引《文子》的證據通常兼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明確指出引自文子或《文子》，二是多為格言習語類的“公共素材”<sup>1</sup>，因此多數難以成立，至少證據是不夠充分的。<sup>2</sup>然而，《文子》和《鹽鐵論》的征引關係卻值得進一步理清。何志華曾考察高誘據今存本《文子》注《淮南子》與《呂氏春秋》以论证

---

<sup>1</sup> 本文採用徐建委的“公共素材”之說來指稱早期中國文獻常見的互見文本現象。見徐建委：《文本革命：劉向、〈漢書·藝文志〉與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5-32頁。

<sup>2</sup> 試圖證明戰國西漢人物文獻（暫不計《淮南子》）曾引用《文子》的代表性研究如下：[宋]王應麟，[清]翁元圻輯注：《困學紀聞注·諸子》，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31-1335頁。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論文子》第6-10頁。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序第4-6頁。王三峽：《文子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129頁。以反思或反駁前者為主的代表性研究如下：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第37頁。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75-85頁，第164-167頁。李銳：《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第77-120頁。

今存本《文子》的编纂下限为东汉高诱生活的年代，极具说服力。<sup>3</sup>后来，何氏在《〈文子〉与先秦两汉典籍重见资料汇编》检得今存本《文子》与《盐铁论》重合资料 13 则<sup>4</sup>，并在《竹简文子研究之回顾与反思》重点分析《盐铁论·本议》“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句与《文子·自然》《淮南子·齐俗》的关系，试图证明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在汉昭帝盐铁会议（前 81）以前就已经完成<sup>5</sup>，将

---

<sup>3</sup> 见高诱注《吕氏春秋》引《文子》的考证，见何志华：《文子著作年代新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4 年，自序 x-xi。高诱注《淮南子》引《文子》的考证，见《高诱据〈文子〉注解〈淮南子〉证》，前掲书第 1-32 页。

<sup>4</sup> 见何志华等编：《〈文子〉与先秦两汉典籍重见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年。由于下文将逐一胪列这 13 则重合资料，加上这些资料散见于多处，因此这里就不一一标出页数。

<sup>5</sup> 见何志华《竹简文子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111-117 页。然而，何志华在文中对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年代有两个说法，导致其观点含混不清。何氏声称：“始元六年，即公元前 81 年，此为《文子》一书对话人物改纂年代之下限。”在采用张丰乾关于魏相征引《文子》“五兵说”的观点时，何氏转引张氏的说法，认为“竹简《文子》既于汉宣帝元康年间被魏相征引，则其成书年代亦当在元康年间（前 65-前 61）之前。”（见前掲书第 114 页。）行文至此并无问题，但何氏在下文推论的 3 点却自相矛盾：“1. 假设魏相两次援引《文子》皆据相同版本，则其所据版本之对话关系已然改纂为‘文子问、老子曰’；易言之，《文子》对话关系之改纂年代乃在宣帝元康年间，约为公元前 65 年至公元前 61 年。2. 魏相两次援引《文子》，第一次见于《文子》非问答题，即‘老子曰’；第二次则见于问答题，即‘文子问老子，老子曰’之相关段落；可证《文子》一书于西汉昭帝时已包含上述两种体裁，并非先由问答题构成，而以非问答题之独白模式‘老子曰’补充增益而成。3. 魏相于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前 81）出席盐铁会议，并于会上援引《文子》“老子曰”之言，可证《文子》书中“老子曰”相关段落，于西汉宣帝时已然存在。”（见前掲书第 116-117 页。）若据其第 3 点，魏相在公元前 81 年援引《文子》“老子曰”之言，那么《文子》书中“老子曰”相关段落，乃至“文子问、老子曰”的对话关系改纂以及今存本《文子》的编纂，都应该在公元前 81

其編纂年代往前推至西漢中期。由於何氏此觀點牽涉到今存本《文子》規格大致成型之時代的關鍵問題，因此有必要加以認真審視，況且這些材料也旁涉了其他西漢人物文獻引《文子》的問題，我們恰好可以將之一併討論。何氏檢得 13 則今存本《文子》與《鹽鐵論》重合資料，但除了《鹽鐵論·本義》“老子曰：‘貧國若有余，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句以外，余者并未加以討論，只是在《〈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編》羅列出來。本文的寫作目的，就是為了檢討這 13 則材料是否都能夠證明鹽鐵會議參會者曾經引用《文子》，以進一步澄清今存本《文子》的編纂年代。為了便於討論，下面將這 13 則材料分作兩類。

1. 《文子》與《鹽鐵論》重合的第一類材料，也跟《淮南子》高度一致，況且多似習語。通過材料排比，材料之間的關係一目了然，根本無法證明《鹽鐵論》一定引自《文子》，因為它們也可能引自《淮南子》或“公共素材”，故不再贅述。

例（1）：

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鹽鐵論·非鞅》記文學語）

---

年的漢昭帝時期，而非漢宣帝時期的公元前 65 年至公元前 61 年。因此，在這模稜兩可的觀點中，本文採用公元前 81 年作為何志華所欲論證的今存本《文子》編纂年代下限。

先合而后连者，不知权。（《文子·道德》第14章）  
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淮南子·汎论》）  
众人先合而后连。（《文子·微明》第14章）  
众人先合而后忤。（《淮南子·人间》）<sup>6</sup>

例（2）：

吴铎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杀。（《盐铁论·利议》记大夫语）

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文子·上德》第3章）

吴铎以声自毁，膏浊以明自铄。（《淮南子·缪称》）

7

例（3）：

檀柘而有乡，萑苇而有藪，言物类之相从也。（《盐铁论·论诽》记丞相史语）

橘柚有乡，萑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文子·上德》第4章）

橘柚有乡，萑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淮南子·说林》）<sup>8</sup>

---

<sup>6</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版，第103页。  
王利器：《文子疏义》，第245页。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56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331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250页。

<sup>7</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358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259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747页。

<sup>8</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331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266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211页。

例（4）：

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鹽鐵論·刺復》記文學語）

責成而不勞。（《文子·自然》第7章）

責成而不勞。（《淮南子·主術》）<sup>9</sup>

例（5）：

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鹽鐵論·詔聖》記御史語）

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文子·上義》第5章）

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淮南子·泛論》）

10

2. 《文子》與《鹽鐵論》重合的第二類材料，除了跟《淮南子》高度一致，也多似習語，有些還跟其他周秦西漢文獻相合，而且都有商榷之處，因此有必要逐個考察。

例（6）：

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余，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滯，工所以備器械，

---

<sup>9</sup>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第143頁。王利器：《文子疏義》，第361頁。何寧：《淮南子集釋》，第605頁。

<sup>10</sup>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第659頁。王利器：《文子疏義》，第472頁。何寧：《淮南子集釋》，第928頁。

非治国之本务也。(《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语)

老子曰：“……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鲜而费多也。……”（《文子·自然》第5章）

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淮南子·齐俗》）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乱国若有余。存国困仓实，亡国困仓虚。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为而民自化。（《文子·微明》第19章）<sup>11</sup>

王利器较早指出《文子·自然》第5章的“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乃《盐铁论·本议》“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之所本。<sup>12</sup>何志华透过比读《盐铁论》《文子》《淮南子》三书，断言“今本《文子》明显因袭《淮南子》而托为‘老子曰’；因之，相关文辞既不见于出土楚简本《老子》、帛书本《老子》，亦不见于传世王弼注本《老子》。《盐铁论》引文称‘老子曰’，显然取自《文子》而

<sup>11</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3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352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773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336页。

<sup>12</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7页。王利器：《文子疏义》，序第4页。

非《淮南子》。”<sup>13</sup>李銳則認為《淮南子·齊俗》之語其實更接近《鹽鐵論·本議》之言，而且《文子》與《淮南子》所說的都不是“貧國”，因此認為他將《本議》篇這條材料歸為與《文子》相關的參考證據，而非直接證據。<sup>14</sup>

然則，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上引《鹽鐵論》《文子》《淮南子》三條材料的關係呢？上述學者其實都默認《淮南子》與《文子》這段話的合理性，而忽視了陶鴻慶的觀點：

“亡”“存”二字當互易，“有餘者非多財也”與“不足者非無貨也”二句亦當互易。原文本云：“存國若不足，亡國若有多”“不足者非無貨也，欲節事寡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民躁而費多也。”上文云“亂國若盛，治國若虛”，又云“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與此文語意正同，特彼以人言，此以財言耳。今本傳寫錯亂，則文義俱不可通矣。《文子·自然》篇誤與此同。<sup>15</sup>

陶鴻慶的觀點還可以從以下二例證之。首先，《鹽鐵論》所載的“貧國若有多，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對應《淮南子》的“亡國若有多”“有餘者非多財也，民躁而費多也”，皆從表面假象（若有多）描述國家的是指狀態（貧國、亡國）。其次，不見於《淮南子》的《文子·微明》採用了反向與正向

<sup>13</sup> 何志華《竹簡文子研究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

<sup>14</sup> 李銳：《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第88-89頁。

<sup>15</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第773頁。



两种描述国家状态的方式，既从表面假象描述国家状态（治国若不足，乱国若有余），也直接描述国家库存的虚实（存国困仓实，亡国困仓虚）。因此，若欲描述存国，只能采取“若不足”的反向手法或“困仓实”的正向手法，“存国若有余”则扞格难通，因为存国不需要“若”有余，它实际上就是有余的。至于《文子·自然》此段，则可能直接因袭了《淮南子·齐俗》此文句舛乱版本。然则，《淮南子》此段在西汉流传的本子是否文义正确、逻辑通畅，抑或最初成书时就已经误写，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既然《淮南子·齐俗》和《文子·自然》此段皆文句舛乱，而盐铁会议文学的引文反而文义通畅，我们就很难说是后者征引自前者了。况且，从《文子·微明》第19章、《淮南子·齐俗》（与《文子·自然》第5章）、盐铁会议文学的征引来看，这三段同文可能来自同一个“公共素材”，而在征引、书写、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异文。《盐铁论》称“老子曰”共3例，而不见于传世和简帛各本《老子》者仅此1例，其出处依然是未解之谜，但我们不能贸然就认为它必定来自《文子》。何志华虽然检出13条《盐铁论》与《文子》互见的材料，但主要是据此条材料推论“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此为《文子》一书对话人物改纂年代之下限。”<sup>16</sup>

---

<sup>16</sup> 何志华《竹简文子研究之回顾与反思》，第114页。

但這畢竟只是孤證，而且經過分析，這“孤證”本身也得打上一個問號。此外，何氏據魏相曾參與鹽鐵會議、後來在宣帝時期引《文子》“五兵說”，而試圖推斷昭帝時期征引“貧國若有余”句的鹽鐵會議參會者正是魏相<sup>17</sup>，也同樣沒有堅實的證據可以支撐。

例（7）：

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牒牝入陣，故駒犊生于戰地。六畜不育于家，五穀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鹽鐵論·未通》記文學語）

師之所在，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第30章）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為不善也！（《文子·微明》第19章）

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于漢。……後三年（前135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此老子所謂“師之所在，荆棘生之”者也。”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

<sup>17</sup> 何志華《竹簡文子研究之回顧與反思》，第114-116頁。

复扰西域。(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汉书·魏相丙吉传》）<sup>18</sup>

文学这段话跟今存本《文子》互见者有两句，即“却走马以粪”和“大军之后，累世不复”。“却走马以粪”出自《老子》第46章，《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和《淮南子·览冥》亦有征引，因此没有充分证据必然引自《文子》。这里只讨论“大军之后，累世不复”。李定生已经注意到王弼注本《老子》第30章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见于王弼注，也不见于景龙碑本、敦煌本、道藏龙兴碑本、帛书本《老子》，《汉书》记刘安“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与魏相引“军旅之后，必有凶年”都没有说是出自《老子》，因此推断是《淮南子》抄袭《文子》。<sup>19</sup>我们不一定要接受李定生断言

---

<sup>18</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210页。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8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336-337页。[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6-2784页，第3136页。

<sup>19</sup> 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校释》，《论文子》第8-10页。

的《淮南子》抄袭《文子》之观点，但有必要留意他所指出的这几个文本现象。

若从兵家习语的视角看待此例，也许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除了录有上引刘安“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之语，其实还记载了主父偃上谏书征引：“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以及吾丘寿王上谏书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李锐指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或为习语，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证据”<sup>20</sup>，有一定道理，正如“起师十万，日费千金”也是兵家习语。<sup>21</sup>吾丘寿王虽然没有细陈“五兵”为何，但“禁暴讨邪”之义明显与《吴子·图国》和《文子·道德》的“五兵说”高度一致。<sup>22</sup>刘安、主父偃、

<sup>20</sup> 李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第88页。

<sup>21</sup> 除了上引《汉书》所记主父偃引兵法书之语，丁原植也检出三条与《文子·微明》第19章“起师十万，日费千金”相合的材料，即《孙子·用间》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尉繚子·将理》曰：“《兵法》云：‘十万之师，日费千金。’”，银雀山汉简本《尉繚子》曰：“故《兵策》曰：‘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见丁原植：《〈文子〉资料探索》，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377-378页。

<sup>22</sup> 《吴子·图国》：“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见陈曦：《吴子 司马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3页。《文子·道德》：“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争小故不胜

吾丘寿王三人皆是汉武帝（前 141—前 87 在位）时人，说明这几条兵家之言最迟在汉武帝时期已经进入现实政治话语空间，乃西汉贵族大臣进谏皇帝是否出兵时的“公共素材”。主父偃引语来自《兵法》，刘安和吾丘寿王的引语所据也可能是兵家书。

此外，“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与“五兵说”这三条材料全见于今存本《文子》却不见于《淮南子》，值得注意。如所周知，兵家以外的先秦西汉诸子传记不乏兵家之论，有以篇为单位者（如《墨子》的《非攻》上中下、《荀子·议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以章为单位者（如《老子》第 30—31 章）。以章为单位的兵论又多见于黄老文献（如马王堆黄老帛书《十六经》的“兵容”与“本伐”两章，《管子·白心》“兵之出”章），这可能与黄老学说的综合性质有关。七千字《文子》的兵论也是以章甚至段为单位，如《文子·道德》第 9 章与《文子·微明》第 19 章“起师十万”段。《道德》篇第 9 章应是采集与兵家书（如《吴子·图国》）共享的“公共素材”“五兵说”，将之发挥以论证“以道王者”和“以兵王者”都是合于王道的。魏相在元康中（前

---

其心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之众，欲见贤于敌国者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王利器：《文子疏义》，第 235-236 页。

65—前 61) 上同一諫書時並引“五兵說”與“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觀魏相所引、《文子》與《吳子》三個“五兵說”的五條名目，不難發現前二者更具親緣性，而後者保留了當時流行的兩種“五兵說”，也不似《文子》“五兵說”結合另一主題（王道）的論述，似乎是更原始的材料。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魏相所引“五兵說”本之於《文子》，但其引“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則不見得一定也來自《文子》。《微明》篇第 19 章並置“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和“師旅之後，必有凶年”這兩條兵家習語，以證《老子》第 31 章的兵家之言。細察魏相和劉安引“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除了文字全同以外，也同樣以民之愁苦之氣傷薄陰陽之和來詮釋之，而《文子》此句不僅在文字上較為不同，也跟“五兵說”的對話體極為不同。因此，魏相所引“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應本於劉安，或跟劉安共享同一個解釋傳統。<sup>23</sup>至於劉安所引、鹽鐵會議文學所引和《文子·微明》互見却互有異文的這條習語，則可能有不同來源（如兵家書或諸子傳記），但三者的共同之處都在於聯繫《老子》的其他章節進行論述。<sup>24</sup>“大軍

<sup>23</sup> 惟魏相其後所說的“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與《文子·微明》所言之“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為不善也！”文義相符，都點出即使打勝仗也無法解決原有問題，反而可能落入惡性循環的風險。究竟是魏相刻意闡釋《文子》，抑或是當時兵論的共識，現存的材料還難以做出進一步的推論。

<sup>24</sup> 劉安引述《老子》第 30 章，作“師之所在，荆棘生之”；鹽鐵會議文學

之后，必有凶年”句不见于简帛诸本、景龙碑本、敦煌本、道藏龙兴碑本和王弼注，却见于王弼注本、河上公本、傅奕本，可知此句在西汉以前不属《老子》。我推测，这句源自兵家的习语由于不断被西汉知识人引述，而且往往配合《老子》经文进行论述，因此在《老子》经典化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老子》经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难以根据盐铁会议文学引语跟《文子》互见而认为前者必然引自后者，而更可能是平行征引不同版本的同一句习语。

例(8):

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而折冲乎千里。……夫贤臣所在，辟除开塞者亦远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盐铁论·崇礼》记贤良语）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文子·上德》第4章）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故国有贤君，折冲万里。（《淮南子·说山》）

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吕氏春秋·召类》）

孔子：“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其征

---

引述第46章，作“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牝牡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文子》则引述第31章和第79章，作“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为不善也！”

也，衽席之上還師。”（《大戴禮記·主言》）

（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風俗通義·正失》）<sup>25</sup>

為了厘清賢良引語與《文子》的關係，我們可以从上引材料所昭示的“公共素材”之流變圖景和考察賢良所引《春秋》這兩個方面着手分析。首先，上引幾條材料關係複雜，但觀其異同，我們还是可以从中大致歸納出幾個類型，條列如下：

A類習語：言若有明主或賢臣在朝廷中主政，必能折沖乎千里之外。其句例見於《大戴禮記》、《呂氏春秋》和《鹽鐵論》賢良語“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沖乎千里”。

B類習語：對舉“山有猛獸”和“國有賢臣”。其句例見於《漢書》鄭昌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鹽鐵論》賢良語“《春秋》曰：‘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采；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

---

<sup>25</sup>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第488頁。王利器：《文子疏義》，第262頁。何寧：《淮南子集釋》，第1119頁、第1126頁。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60頁。[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漢]班固：《漢書》，第3247頁。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版，第124頁。



C类习语：并举“山有猛兽”“园有螫虫”“国有贤君/臣”。然而，在B类习语中原本对应“山有猛兽”的“藜藿/葵藿”，却在C类习语对应新喻“园有螫虫”。此外，C类习语的“国有贤君/臣”并不与B类习语对应，却跟A类习语的“折冲千里”相对应。其句例见于《淮南子》和《文子》。

D类习语：“山有猛虎”不再跟否定性语句“藜藿/葵藿为之不采”对应，而以“草木茂长”正面述之。其句例见于东汉《风俗通义》引“《传》曰”。

根据上述归纳，我们可以合理推断A类习语与B类习语原本分属两类不相属的“公共素材”。惟二者都欲说明明主贤臣在朝廷主政的重要意义，因此贤良将A类习语和B类习语采入他的同一段论述之中，而《淮南子》《文子》则将二者融合改写成了C类习语。然则，贤良一定是借鉴了《淮南子》或《文子》吗？观贤良之语，显然跟更原始的A类习语和B类习语更具亲缘性，而跟融合改写后的C类习语（见于《淮南子》《文子》者）关系更远。郑昌与贤良、桓宽年代相若，引语相似，很能说明他们的引语来自同一文献的不同写本。尽管《淮南子》的编定比郑昌等人的活跃年代早数十年，但后者所引文献也完全可能早于《淮南子》。此外，习语“山有猛虎”并非只有B类与C类，我们还可以在东汉《风俗通义》“《传》曰”看到其变型的D类，说明这一族类的“公共素

材”生命力之強大。

其二，賢良所引《春秋》究竟是哪部書？張豐乾指出，“《鹽鐵論》的編定和蓋寬饒（案：前 105-前 60）的活動時期都是在漢宣帝時期，《鹽鐵論》的編者桓寬又是治《春秋》的專家，他所指出的出處，應該是非常可靠的，換言之，鄭昌所引用的是《春秋》之言，而不是《文子》中的話。”<sup>26</sup>張氏提示我們要留意桓寬身為《春秋》學者的身份，以證之不會輕易在《春秋》引語上出錯，很有道理。我在這裡只是想進一步強調，《鹽鐵論》所記《春秋》，不一定是《春秋》經，而可能是《春秋》三傳。徐建委指出，西漢諸子傳記稱引《春秋》時，多引三傳而不引經文，也徑稱三傳為《春秋》，而三傳的寫定和經典化由西漢綿延至東漢初，此期間三傳內部多有異文。<sup>27</sup>因此，《鹽鐵論》里不見於今存本《春秋》三傳的《春秋》佚文（如 B 類習語），或許出自經典化以前乃至寫定以前的某部《春秋》傳早期版本。如果以《淮南子》的 C 類習語為下限，這部《春秋》傳應在漢武帝以前就載有 B 類習語。

例（9）：

《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

---

<sup>26</sup> 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第 76 頁。

<sup>27</sup> 徐建委：《文本革命：劉向、〈漢書·藝文志〉與早期文本研究》，第 56-59 頁。

察，察察可以为匹夫。”（《盐铁论·刺复》记文学语）

故为政，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上礼》第8章）

其为政也，以苛以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淮南子·道应》）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58章）<sup>28</sup>

文学所引《春秋》之语，与其说引自《文子》或《淮南子》，倒不如说跟《老子》原文更具亲缘性，然而也仅有“其政察察”相合，何况文学称这句话源自《春秋》。据例（8）分析，文学所引《春秋》之语也应当是某部《春秋》传早期版本的佚文，与《文子》无涉。

例（10）：

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盐铁论·救匱》记贤良语）

圣人由近以知远，以万异为一同，气蒸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耻陵迟，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文子·下德》第8章）

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

---

<sup>28</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43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535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903页。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51页。

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淮南子·本經》》<sup>29</sup>

“廉耻陵迟”出现于《文子·下德》与《淮南子·本经》的互见段落，但《淮南子·本经》却恰仅不见此四字。丁原植认为，《文子·下德》第8章“‘廉耻陵迟’，与前后文文意无关，当为他处残文窜入”。<sup>30</sup>观之《淮南子》与《文子》中的“及至世之衰”类似的“及其衰也”“及世之衰也”“至其衰也”句式用例里，句首“及”或“至”字通常表示另起新句或新分句。像“廉耻陵迟，及至世之衰”的用例，则仅此一例，也于义难通。本文认同丁原植的看法，即《文子·下德》的“廉耻陵迟”乃窜入之文，同时也无法证明贤良此语一定援引自《文子》。

例（11）：

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盐铁论·论儒》记御史语》

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圣人为之。《《文子·上义》》

<sup>29</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447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397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568页。

<sup>30</sup> 丁原植：《〈文子〉资料探索》，第448页。

第9章)

諛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淮南子·汜论》)

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为之。(《文子·上义》第11章)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淮南子·泰族》)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sup>31</sup>

《盐铁论》此篇名《论儒》，御史以孔孟为例，讽刺儒家拘泥于道德原则而不懂得在游说诸侯时稍作权变，由此屡遭困厄，并以“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作结，主张君子为达目的可以作出某种妥协。“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看似出自《文子·上义》，但若观御史的议论及其枉直之喻，则可知其本之于《孟子·滕文公下》陈代与孟子的对话。“枉尺而直寻”是战国就流行的一句习语，载于某《志》书。《盐铁论》

---

<sup>31</sup>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65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481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961页。王利器：《文子疏义》，第487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408页。[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版，第439-445页。

《文子》《淮南子》都有下半句“君子為之”或“聖人為之”，《志》書也應作如是，只是陳代摘引了前半句“枉尺而直尋”而已。從《志》書的記載以及陳代和御史的態度可知，在道德原則上作出妥協以達成目的是戰國西漢社會上的主流取向，即以事功為尚。孟子對“枉尺而直尋”的批評，反而是社會的逆流。因此，雖然“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在語詞表面上與《文子·上義》第9章和第11章相近，但其實是援引當時習語針對孟子的議論而發，而無涉於《文子》。

例（12）：

持規而非矩，執准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睹不信心，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应当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鹽鐵論·相刺》記大夫語）

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文子·道德》第12章）

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淮南子·齊俗》）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揚雄《法言·先知》）<sup>32</sup>

<sup>32</sup>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第281頁。王利器：《文子疏義》，第239頁。

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和《史记》之征引，扬雄引“或曰”之语，以及盐铁会议的大夫之语，可知“胶柱而调瑟”是西汉习语，用以暗讽不知权变之人，特指在面对古今礼法时候的顽固态度，应与《文子》无涉。

例（13）：

山陵不让椒跬以成其崇，君子不辞负薪之言以广其名。故多见者博，多闻者知，距谏者塞，专己者孤。故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诗》云：“询于刍蕘。”（《盐铁论·刺议》记丞相史语）

夫天地不怀一物，阴阳不产一类；故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让枉挠以成其崇，圣人不辞其负薪之言以广其名。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浅矣。（《文子·自然》第4章）

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矣，而所治者浅矣。（《淮南子·泰族》）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形势解》）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

---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790页。[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65页。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2页。

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史記·李斯列傳》所載《諫逐客書》）

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韓詩外傳·卷三》記東野鄙人答齊桓公）<sup>33</sup>

從《管子·形勢解》《諫逐客書》《韓詩外傳·卷三》《淮南子·泰族》可見，以山、海並舉為喻來說明君主廣納人才的度量是當時習用的譬喻。然而丞相史在鹽鐵會議征引的可能並非《文子·自然》，而是取材自《韓詩外傳·卷三》。《韓詩外傳·卷三》東野鄙人既引廣納人才的山、海之喻，又引《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說明廣納眾言之意。丞相史征引略為變形的山陵、君子之喻，同樣引《詩》“詢于芻蕘”以啟廣納諫言之旨。如此看來，我們也無法否定《文子·自然》第4章拼合《淮南子·泰族》和《鹽鐵論·刺議》的可能性。

---

<sup>33</sup>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第351-352頁。王利器：《文子疏義》，第350頁。何寧：《淮南子集釋》，第1396頁。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178頁。[漢]司馬遷：《史記》（修訂本），第3089-3090頁。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1頁。



## 结 语

经上述材料之排比与分析,所谓《文子》与《盐铁论》有13条材料重合者,都无法作为盐铁会议参会者引用《文子》的证明,多数材料其实都可以用共享“公共素材”的角度来理解。在分析上述材料的过程中,本节也援引了其他西汉人物或文献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间的错综关系。以目前可见的材料来说,魏相“五兵说”依然是唯一一条最有可能引自《文子》的现存西汉材料,但并无助于佐证盐铁会议参会者曾经引用《文子》。因此,何志华认为今存本《文子》的编纂在汉昭帝盐铁会议以前就完成了的观点并无法成立。今存本《文子》的编辑发生在盐铁会议以后的可能性仍然无法被完全否定,而目前最有力的论证也同样来自何志华的早期研究,即今存本《文子》编纂年代的下限应定在东汉高诱据《文子》注解《吕氏春秋》《淮南子》的时代。

##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陈曦,《吴子 司马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 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何志華，《竹簡文子研究之回顧與反思》，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何志華等編，《〈文子〉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匯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版，
- 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李銳，《同文與族本——新出簡帛與古書形成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漢]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版。
-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版。
-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王三峽，《文子探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宋]王應麟，[清]翁元圻輯注，《困學紀聞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6年。

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张丰乾,《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Rethink the Relation between *Wenzi* and *Yantielun***

CHOONG Hock Ke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Ho Che Wah's research, he asserts that there are 13 overlapped texts between received *Wenzi* and *Yantielun*. He deduces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received *Wenzi* has already been completed before the

year (81 BCE) when the *Yantie* Conference was held. However, Ho's account casts some doubts and cannot firmly prove the *Yanti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quoted the texts of received *Wenz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st of the overlapped text can be comprehe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material". Hence, Ho's account is untenable and there is still a possibility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received *Wenzi* was completed after 81 BCE.

### **Keywords**

*Wenzi*, *Yantielun*, Laozi said, Poor Country Seems  
Excessive, Public Material